

論文

海外神社的在地化？

——以小笠原省三在中国的活动为中心——

谢 任

XIE Ren

南京大学 助理研究员

【摘要】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势力不断扩张，国家神道也随之走向海外。在此过程中，神道的活动场所与象征建筑——神社——既处海外，就必须面对是否以及如何在地化的问题。大体而言，日本官民多支持在海外建造神社，但对于小笠原省三等人推动的在地化进程却予以反对。表面上，在地化涉及海外神社的建筑样式、祭神选择等技术性议题；从更深层次看，它是日本帝国扩张与宗教调适之间互相缠斗的产物，是一个无解的难题。

【关键词】 日本；海外神社；在地化；宗教；帝国

Localization of the Oversea Shrines?

——Centered on the Activities of Ogasawara Shozo in China——

Abstract : After Meiji Restoration, the Japanese forces continued to expand, and State Shinto that combined traditional elements with the will of state also went overseas. In this process, shrines that were the symbolic architecture of Shinto must face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and how to be localized. In general, Japanese officials and civilians supported the construction of oversea shrines, but opposed the localization process promoted by Ogasawara Shozo and others. On the surface, localization involved technical issues such as the selection of architectural styles and immortals. On a deeper level, however, it was the product of the struggle between the expansion of the Japanese empire and religious adjustment, and the unresolved issue indicated the fate of the collapse of the Japanese empire.

Keywords : Japan ; Oversea Shrines ; Localization ; Religion ; Empire

引言

帝国扩张常伴随宗教的渗透，而对外渗透的宗教则要面临是否以及如何与新环境相调适的选择。在日本对外扩张的过程中，兼具传统宗教色彩与近代国家意志的神道教跨出国门，在海外建立起其象征物——神社。这些明治维新以后建造于日本新开辟的领土、殖民地、势力范围以及日侨聚居地的神社，被统称为“海外神社”⁽¹⁾。

对于海外神社，日本学界早有研究。日本战败后不久，以小笠原省三为代表的神道学者就开始了海外神社相关史料的搜集与整理工作。在此基础上，研究者们首先将海外神社与日本帝国的殖民地支配和

皇民化政策联系起来，其后则转换研究视角，注重神社与其所处环境进行接触、碰撞和调适的实态。⁽²⁾新田光子对大连神社的研究，⁽³⁾菅浩二对朝鲜和台湾两地神社的研究（主要是关于祭神问题的研究），⁽⁴⁾正是此类研究的代表。作为日本曾经的殖民地，台湾地区建立了很多神社，因而台湾学者对台湾的神社问题也有不少研究。他们早期的研究将神社视为日本“皇民化政策”的手段；⁽⁵⁾近年则着重指出神社作为同化手段有其局限性。⁽⁶⁾相较而言，中国大陆的学者主要将日本的海外神社置于日本侵华战争的脉络中，视为日本帝国主义同化中国民众的具体表现。⁽⁷⁾研究多集中在日方机构或个人上。⁽⁸⁾

本文的重点在于神社本身，尤其是海外神社在地化问题。大体而言，除小笠原省三等少数人外，多数日本官民都支持海外神社的建造，但反对在地化。本文首先将对在地化的主要内容作概要说明，在此基础上，鉴于北京神社是作为“在支神社的模范”筹建起来的，⁽⁹⁾南京神社则是位于沦陷区政治中心的神社，因此本文将对它们作重点考察。此外，因祭神问题直接关系到神社在地化的程度，本文也将专节讨论。

1. 海外神社：日本的还是海外的？

神道教起源于古代日本，注重村落共同体的集体仪式。明治以后，神道教附和近代天皇制，成为“被发明的传统”——“国家神道”。⁽¹⁰⁾在国家神道指导下的海外神社，自是一种因应现实政治需要而出现的事物。但在日本战败前，日本人很少有这种认识。在1941年出版的《大陆神社大观》中，作者岩下傅四郎以“神社何以尊贵”为题，专章说明了他对神社与神道的理解。文中，他强调“大日本乃神国也”，日本为神所创造，万世一系的天皇统治是日本的“国体”。⁽¹²⁾“国体”概念具有极强的防御性和攻击性，⁽¹³⁾但在岩下看来，日本的“国体”举世无双，最为尊贵。⁽¹⁴⁾在推崇日本相对于其他国家的独特性与优越性的同时，时人还强调“神国”日本有世界性的使命——“将生命之光普照于世界，为万邦千族点亮灵火”。⁽¹⁵⁾这两个对神社的定位也反映在“在地化”问题上。

所谓在地化，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神社的建筑样式，二是神社的祭神选择，三是神社的祭祀形式。祭神问题直接关系到神社的性质及其担负的职能，因而最受关注。以朝鲜来说，祭神包括日本的“皇祖神”——天照大神、与朝鲜“建邦神”同位的日本神灵素戔鸣尊，以及“朝鲜之祖宗”檀君等。⁽¹⁶⁾前文提到的小笠原省三，是以朝鲜神宫的祭神之争为契机，加入海外神社建设运动的。⁽¹⁷⁾虽然争论的结果让小笠原极为失望，⁽¹⁸⁾但由此也激发了他参与和推动海外神社建设的热情。

1928年7月，小笠原省三以内务省嘱托的身份，在諏访神社宫司高阶研一的委托下，前往巴西推进神社建设工作。然而，当地的日侨和外交官员不予支持，结果以失败告终。其后，他先后组织或参与了“东亚民族文化协会”“海外神社问题研究会”“海外神社协会”等团体，⁽¹⁹⁾并多次前往朝鲜、中国的东北、华北以及华中等地参与神社筹建工作，直至日本战败。⁽²⁰⁾在此过程中，小笠原始终坚持海外神社在地化的主张，认为神社作为一种人类文化现象，自然会受到时代与风土的影响乃至支配。相应地，神社的祭神、祭祀样式等也不必拘泥于日本原有的规定。以巴西为例，他主张在奉祀皇室之祖神天照皇大神的同时，也应奉祀开拓巴西的伟人彼得罗；社殿应集合日本的神社精粹，同时充分考虑巴西的气候与习惯，⁽²¹⁾以便日本人和巴西人都能自由礼拜。

在中国的神社建设中，小笠原同样坚持在地化的主张。1938年4月，他草拟了《满洲及支那应奉斋之神社的基本条件》（以下简称《基本条件》），较为详细地叙述了他理想中的神社样式。在文章起

始，小笠原强调神社并非一成不变，而应“常与时代和环境顺应调和”。因为神社本就担负着普及于世界的使命。为此，祭神、社殿等都不能照搬日本国内，而必须与所在地区相调适。祭神方面，小笠原主张奉祀天照大神、天神地祇以及国魂神。除了天照大神是日本祖神外，天神地祇极为笼统，国魂神则是“本土”神灵（详见下文）。在社殿方面，小笠原主张以权现造（神社的建筑样式之一，本殿与拜殿通过币殿连为一体）为主体，与中国庙宇的样式相调和。此外，鸟居、狛犬等神社的附属建筑物也应与中国本土的样式相调和，洗手池可以用香炉等物替代。在祭祀形式方面，小笠原主张祭祀服装不要使用白色——在日本，神职人员多着白色服装；但在中国，白色为丧事所用之色。对于祭词，他希望能让中国人易于明了。最能直接体现在地化理念的是关于神社与中国人关系的论述。他提出，神社最初以日本人为中心，但应逐渐扩大到其他民族，使所有人都成为“氏子”（即居住在神社所在之地的信仰者）。不仅如此，神社的神职人员为日本人固然好，但也应逐渐采用中国人。⁽²²⁾总之，在中国的神社不应处于日本国内的“延长线”上，而应与本地相调适，实现在地化。

然而，小笠原在地化的主张遭遇了颇多阻力。例如，1939年小笠原提出蒙疆神社应以成吉思汗为祭神，就遭到驻屯军的参谋长坚决反对，为此二人发生了激烈的争执。⁽²³⁾此外，兴亚院也是海外神社在地化的反对力量。兴亚院是日本管理中国占领区的政治、经济及文化事务的中央机构，⁽²⁴⁾1940年12月，该院专门就海外神社问题宣布意见：一方面，与日本的对外扩张相呼应，兴亚院支持在海外建立神社；另一方面，坚决反对海外神社的在地化。兴亚院认为神社祭神乃“帝国之神祇”，不应奉祀具有本地色彩的国魂神——即使需要奉祀国土开发之神，也应是日本的神灵。关于社殿，兴亚院要求依照“内地之例”进行建设，并特别提到不得“迎合支那人之民俗”。在神职、祭祀等方面，兴亚院也坚持日本国内的标准，反对与当地进行任何形式的调适。⁽²⁵⁾

兴亚院的主张代表了日本中央政府的意见，这说明海外神社的在地化受到了来自日本内部的阻力。进一步而言，日本帝国的扩张促使神道教走向海外，但其对海外神社在地化的反对，某种程度上又抑制了其在宗教领域的扩张。当然，在具体筹建的过程中，在地化的展开并非易事，一座神社能否建成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实现在地化，尚需具体分析。

II. 北京神社：难以树立的“模范”

是否需要在地化？如何在地化？这是小笠原参与筹建北京神社时的首要问题。1934年3月，小笠原第一次来到北平。⁽²⁶⁾当他提出筹建北京神社的建议时，日本居留民会会长及小学校长等没有给予积极的回应，直到1938年夏，负责北京神社建设的“北京神社奉斋会”才正式设立。⁽²⁷⁾

按照《在中华民国神社规则》的要求，建立神社须由二十名以上的氏子或崇敬者联名向所在地的领事馆提出申请，获得许可后方得设立。⁽²⁸⁾不仅如此，神社的维持、移转、废止也都要接受领事馆的指示。⁽²⁹⁾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全面侵入中国，成为占领区实际上的主宰者，这是影响和推动神社建设的关键因素。另外，鉴于神社行政的重要性，1939年3月1日，日本外务大臣有田八郎要求将海外神社行政的裁夺权由领事馆提升至外务大臣本人，小笠原正是以外务省嘱托的身份参与各地的神社建设工作的。⁽³⁰⁾由此可见，海外神社建设与维持受到侨民、领事馆、驻军、外务省以及神职人员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为了明了此间之复杂，这里不妨以小笠原省三促成“北京神社奉斋会”的相关日记为线索略作说明。

1938年6月14日，小笠原从日本出发，经朝鲜和伪满洲国，于6月22日深夜抵达北京。次日，

他与神职人员高阶研一⁽³¹⁾一起拜访北京居留民会会长小菅勇。高阶与小笠原省三相识甚早。小笠原1933年接受諏访神社宫司委托，赴巴西筹建神社，当时的諏访神社宫司正是高阶研一。1938年前后的高阶担任皇典讲研究所理事⁽³²⁾，与小笠原参与北京神社的筹建工作。在海外神社在地化的问题上，高阶是小笠原的同道。北京神社建立后，他曾辞去一切公职与小笠原共同筹备另一机构——皇典讲研究所华北总署⁽³³⁾。此为后话，这天，由于小菅不在，他们的会谈没有实现。

6月30日，小笠原与华北方面军特务部部长根本博讨论建造神社的问题。会谈没有明确的结果，但小笠原与特务部建立了联系，并成了特务部的嘱托。小笠原在7月3日的日记中提到，北京神社的座谈会之所以未能开成，是因为居留民会内部存在矛盾。由于居留民会直接负责神社的筹建工作，其内部的不和显然会影响北京神社的建设进度。于是，小笠原当天便向少将喜多诚一求助，喜多给小笠原介绍了从天津总领事调任北京总领事的堀内干城。7月5日中午，小笠原与堀内会面，讨论北京神社问题⁽³⁴⁾。7月15日，堀内在日本驻北京“大使馆”内召开会议，决定设立北京神社奉斋会。

奉斋会的成立并不意味着海外神社在地化能够顺利推行。1939年秋，在代理总领事野田实之主持的北京神社奉斋会会议上，小笠原陈述了对北京神社的具体意见，以便确定社殿样式、祭神等，但建立与中国庙宇相调和的理想社殿的计划未能实现。究其原因，除了缺乏优秀的设计者、工匠、必要的材料以及经费外，日侨的态度也极其强硬，小笠原说：侨民们“对祖国和乡里的热爱成了建设与本地顺应调和的社殿的巨大障碍”。他们“热切”希望社殿的样式为神明造（神社的建筑样式之一，悬山顶，屋顶无曲面，正面进入，伊势神宫为代表），这让小笠原不得不停步。不过，在祭神问题上小笠原没有退让，他力陈以国魂大神为祭神的必要性。最终，代理总领事野田宣布北京神社的祭神为：天照大神、明治天皇、国魂大神⁽³⁵⁾。

1940年6月24日夜至25日晨，北京神社举行落成典礼。从下图来看，社殿最终采用了侨民所期待的神明造，屋脊之上的千木与桧木突出了日式风格。不仅如此，北京神社的宫司有贺四郎在落成时还宣布：“北京神社的祭神天照大神是镇座于神风伊势之国五十铃川上的天照皇大御神的分灵，国魂神是长野县的生岛足岛神社的分灵。”对此，小笠原立即表示不满：有贺对“国魂神”的解释完全错误。前已提及，小笠原将国魂（大）神界定为北京的本土神灵，并非来自日本。然而，有贺坚持自己的主张⁽³⁶⁾。作为宫司，有贺十分清楚神社的祭神究竟来自何方，在神社落成典礼上，总领事土田丰已明确说，国魂大神乃是“本地的大地之神灵”，而奉祀本地国魂大神则是“我国优美的习俗”⁽³⁷⁾。有贺之所以有意将国魂



图1 北京神社社殿

图片来源 神奈川大学非文字資料研究センター
<http://www.himoji.jp/database/db04/permalink.php?id=131>, 2022年12月6日。

大神说成是生岛足岛神社的分灵，乃是因为他之前是生岛足岛神社的宫司⁽³⁸⁾，这种移花接木的做法表明他对以北京本土神灵为祭神的反对。

小笠原对北京神社的现状同样不满。他的理想是在海外建立在地化的神社，使其与时代和环境相适应。但无论是作为“模范”的北京神社，还是华北其它的神社，都无法令其满意。1953年，在回顾北京及华北各地的神社问题时，小笠原写道：“虽然北京神社建成了，但‘神社’依然是内地的神社，神职人员也常与我意见分歧。”⁽³⁹⁾确实，除了在祭神问题

上小笠原取得了部分“胜利”——国魂大神虽成为祭神，但其本土性并未得到认可，海外神社在地化的其他“基本条件”几乎全未实现。⁽⁴⁰⁾

由上可见，北京神社虽是被作为“模范”而建立起来的，但实际上只是小笠原在中国建立在地化神社的第一个尝试。与其说它是一个“模范”，不如说它是一个试图调适海外神社的日本属性与在地属性的不成功的试验。同时，它也是一个参照物，一个为后来建立的南京神社提供参考与比较对象的参照物。

III. 南京神社：不断变动的规划

1938年4月，南京日侨“决定在南京的中心区建立一条日人街”，三十万的预算中有五万用于建造公园和神社。⁽⁴¹⁾1939年5月，南京神社的建设规划正式开启。

5月7日，居留民会评议员会决议建立神社，10日确定了“奉斋会事项会则”。⁽⁴²⁾10月6日，“南京神社御造营奉斋会”成立，随即召开第一次理事会。在会后发表的文告中，祭神、选址、经费等一应决定：祭神为天照大神、明治天皇、国魂神（暂定）三柱，地址定在南京城内的五台山高地，建设经费三十万元。在奉斋会常务理事西岛五一看来，南京“现在是维新政府的首都，也将是即将诞生的新中国中央政权的所在地。另一方面，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也设置于此，是名副其实的支那的军、政中心地”。⁽⁴⁴⁾

位于“军、政中心地”的南京神社建造得并不顺利，经费问题首当其冲。1938年4月提议创建南京神社时，预算为五万元，以如此之少的预算无法建成与南京地位相称的神社。与其它神社相比，五万元的预算也着实不足。据日方领事馆的报告，济南神社的工费为三十万元，⁽⁴⁵⁾蚌埠神社设立费用十二万一千余元。⁽⁴⁶⁾结果，南京神社的建设经费在不断增加。据1941年3月的报道，建造费提升至四十万元。⁽⁴⁷⁾1942年增加到六十五万元，但直到当年4月底，仅募集到二十五万五千元。另外，南京神社所需桧木来自台湾，共需六百石（笔者按：石为木材的体积单位，1石=10立方尺），由于太平洋战争爆发，也无法按时运抵。⁽⁴⁸⁾

在南京神社的筹建过程中，祭神也是一个重要问题。决议之初，南京神社的第三柱祭神暂定为国魂神，但最终确定的是“国魂大神”。其间的曲折虽难以确知，但有迹可循。在北京神社建造过程中，小笠原起初使用“国魂神”，1939年则主张“国魂大神”。⁽⁴⁹⁾南京神社奉斋会最终放弃“国魂神”而选用“国魂大神”，未始非小笠原活动的结果。因为，小笠原于1940年1月被邀请到上海、南京等地参与神社工作，而南京神社的祭神从“国魂神”改为“国魂大神”正在这一时期。⁽⁵⁰⁾

对于社殿样式，小笠原颇为满意。前述理事会议关于社殿样式并无特别说明，但在《基本条件》一文中，小笠原提出“以权现造为主体，并与中国庙宇的样式相调和”。权现造的本殿与拜殿均为歇山顶，中间以币殿连为一体，且币殿的屋脊与本殿和拜殿垂直（见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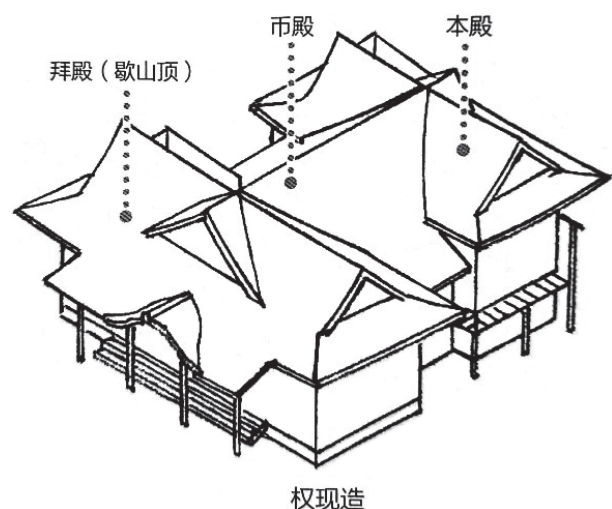


图2 权现造

图片来源 妻木靖延：《图解日本建筑》，温静译，南京：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2018年，第50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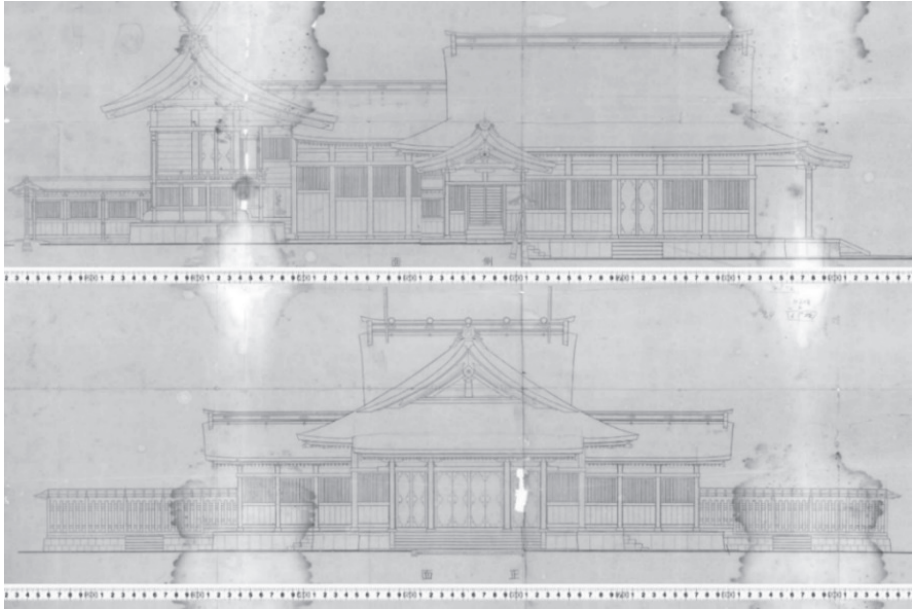


图3 南京神社殿新筑设计图

图片说明 该图作于1941年10月15日。

图片来源 松本康隆所赠。另参见神奈川大学非文字资料研究センター

<http://www.himoji.jp/database/db04/permalink.php?id=3614>, 2022年12月6日。



图4 南京神社

图片说明 该图为1944年夏德国摄影师赫达·莫理逊 (Hedda Morrison) 拍摄。

图片来源 哈佛燕京图书馆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http://id.lib.harvard.edu/images/olvwork595066/catalog>, 2022年12月6日

图)。参拜时，参拜者朝向与拜殿屋脊平行的一侧（日语为“平入り”）。从设计图看，南京神社拜殿与本殿确实连为一体，这符合权现造的要求。然而，若分别考察拜殿与本殿就会发现，虽然拜殿为歇山顶，但参拜者在参拜时朝向的是与拜殿屋脊垂直的一侧（日语为“妻入り”）。不仅如此，本殿也不再是歇山顶，而是一种近似于悬山顶的建筑样式（日语为“流造”）。这种建筑样式大概是权现造的变体，很⁽⁵¹⁾

难归入到其它的社殿样式之中。此外，从拜殿正面看，设计师有意将本殿屋脊上神社建筑独有的千木和鯉木（北京神社亦有之）突显出来，但神社建成后的照片及现存社殿却不见千木和鯉木。无论这是视角不同造成的，还是建设过程中做了改动，南京神社的独特之处显而易见，并非照搬日本固有的社殿样式。

如果说祭神和社殿样式是小笠原省三所期待的，那么在南京神社境内建立护国神社，则是其始料未及的。护国神社源于明治时期的招魂社，是一种将战死者奉为神灵加以祭祀和显彰的慰灵设施。东京招魂社于1879年改称“靖国神社”，合祀来自全日本的战死者；各地的招魂社则未改名，仅奉祀出身于本地的战死者⁽⁵²⁾。1939年，日本政府正式将招魂社改名为护国神社，以加强对各地招魂社的统合，使之成为“地方的靖国”⁽⁵³⁾。可以说，日本国内的护国神社既是国家意志的体现，也有极强的地域性。或许正因如此，日本仅在上海、北京、南京、九江等少数城市建有护国神社⁽⁵⁴⁾。1941年10月6日，日本驻南京总领事向外务大臣发出一份“秘”级电报，全文如下：

丰田外务大臣

第一二九号

军队方面强烈希望在建造南京神社的同时，于神社社殿的右侧建造护国神社，作为境内社存在。十七日也举行了地镇祭。本馆暂行许可，并已向本省（引者按：指外务省）提出追加手续。如右处理是否有当，祈请尽快回电。（完）

⁽⁵⁵⁾
杉原总领事

这份电报透露了两条重要信息：首先，建造护国神社的主张出自军队方面。在日本，护国神社大多由地方将招魂社改造而来；但在南京，直到日军侵入前日侨人数都十分有限，其后虽有所增加，但他们并无建造护国神社的意愿。于是，护国神社原有的地域属性完全脱落，而成为宣扬国家意志，进行彰显战死者的工具。另一方面，日本国内的护国神社只以出身本地的战死者为奉祀对象，南京护国神社则将在南京地区战死的日军士兵及军属作为祭神⁽⁵⁷⁾。

第二条信息是，护国神社被规划为南京神社的境内社，后来也确实如此被建成⁽⁵⁸⁾。而在日本国内，并无将护国神社作为其它神社的境内社的先例。相反，招魂社改称护国神社后，相应的扩建事业也会同时进行⁽⁵⁹⁾。但在中国，将护国神社附属于其他神社的情形并非孤例：九江护国神社就设置在九江神社内。1942年3月18日，外务大臣东乡茂德明确提出，最好不要将九江护国神社设置于九江神社境内；如不得已，也应尽可能将二者区隔开来⁽⁶⁰⁾。由此推断：将南京护国神社建于南京神社内不仅不符合日本国内的做法，也非日本外交部门的愿望，而仅是军方的意志。

讽刺的是，这种做法某种程度上实现了神社在地化，却动摇了海外神社在地化的根本目标。这是因为，虽然南京神社的在地化程度略高于北京神社，但以日军战死者为祭神的南京护国神社与南京神社处于同一空间内，使得本就具有侵略色彩的南京神社进一步成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象征。

IV. 祭神之争：在地化问题的焦点

在海外神社的建设过程中，关于在地化的分歧反映在祭神的选择、社殿的样式、祭祀的仪式等多个方面，其中争议最大的当数祭神问题。因为每一祭神都具有特定的象征意义，表达着神社建立者在现实

中的诉求。

天照大神是日本神话中的主神，也是日本皇室的祖神，将其作为海外神社的首选祭神似乎顺理成章，但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地区则情形各异。例如，台湾地区的神社祭神就是以在台湾病死的北白川宫能久亲王为主祭神的情况最多，直到1944年天照大神才以“增祀”形式进入台湾社格（神社的等级）最高的神社台湾神宫。朝鲜则不同，以天照大神为祭神的神社很早就出现，且数量最多。在朝鲜被日本吞并前，建立于朝鲜的神社之所以以天照大神为祭神，是为了强化日本侨民的国族认同；但在朝鲜被吞并后，为了合理化日本对朝鲜的侵略与吞并事实，“日鲜同祖论”便流行开来。相应地，天照大神便具有了日本和朝鲜的共同祖神的意义。至于明治天皇，他不仅是近代日本的“帝国”之祖，而且也是在他统治时期解决了“日鲜合并”这一“二千年来的悬案”⁽⁶¹⁾。

即使是同一祭神，在不同历史语境中其意义也会有所不同。以东北来说，建立以天照大神为祭神的建国神庙固然是为了在精神领域强化日本与伪满之间的关系；但与此同时，伪满的宫内势力与日本官僚之所以推动此事，则是有意通过天照大神来强化溥仪的“皇帝”权威，从而形成对关东军的遏制。在中国关内占领区内则是另一番情形。一方面，部分日本机关与官僚的确希望通过让中国人对“神国日本”及其“皇祖皇宗之圣德”的“祭拜”与“崇敬”，以控制中国人的精神与信仰⁽⁶²⁾。另一方面，虽然天照大神与中国古代神话颇有渊源，但在包括小笠原省三在内的日本人的论述中，天照大神和明治天皇之于中国人的意义并未得到明确的阐释，哪怕这种阐释是脱离历史或文化传统的⁽⁶³⁾。在占领区，日本所宣扬的东亚与世界“和平”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政治口号。他们虽有令中国人“祭拜”和“崇敬”天照大神与明治天皇的企图，却在理论依据和政治说辞方面存在无法解决的困境，因而终究无法将其企图真正落实在社会和政治生活中⁽⁶⁴⁾。

小笠原主张以具有本土色彩的“国魂大神”为祭神，正是考虑到了海外神社的祭神与本地居民的关系问题。早在朝鲜神宫镇座祭（1925年）前后，小笠原便参与到关于祭神的争论中。当时，名为“国魂大神”的祭神尚不存在，他主张除天照大神和明治天皇（此点基本无争议）外，还应奉为祭神的是朝鲜传说中的开国之君“檀君”。但这一主张受阻，最后檀君和其他朝鲜的建国有功者合并为一柱，统称为“国魂神”（后改称为“国魂大神”）⁽⁶⁵⁾。换言之，“国魂大神”是本地神灵与日本神话相结合、相妥协的产物。实际上，在小笠原及其他主张以国魂大神／国魂神为祭神的神道家的表述中，国魂神信仰也确实被建构为日本的“传统”⁽⁶⁶⁾。小笠原就明确提出，对国魂神的祭祀是“日本最古老的信仰”，但从1925年的朝鲜神宫开始，这一“传统”被打破；直到1934年，朝鲜的京城神社才确定以国魂大神为祭神⁽⁶⁷⁾。

在朝鲜，小笠原等人以国魂大神为祭神的本意是强调“土著性”。但在具体实践中，国魂大神的本土色彩却被剥离，成为一种相对日本“中央”的、位于边缘和“地方”的象征⁽⁶⁸⁾。而在并非日本“领土”的地区，情形又有所不同。小笠原曾去过的巴西自不必说，即使在中国占领区，占领者与被占领者也非“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这就使海外神社的在地化受到更多因素的影响，除了侨民团体、占领军、领事馆、神道活动家等日方因素，甚至伪政权方面也可能影响祭神的选择。如在筹建蒙疆神社时，小笠原就专门与德王进行了会谈，商定以成吉思汗为祭神之一。这一意见遭到了驻屯军参谋长的强烈反对，最终未能实现⁽⁶⁹⁾。建成后的蒙疆神社祭神除了天照大神、明治天皇、国魂大神，还有1940年9月4日死于飞机事故的北白川宫永久王。

由此看来，无论是在朝鲜、巴西还是在中国，小笠原的主张都没有实质的改变：在朝鲜，他主张以檀君为祭神；在巴西，他主张以彼得罗为祭神；在“蒙疆”，他主张以成吉思汗为祭神。总之，都是通

the times.” The painting’s impact can be recognized in the fact that many similar works were created after that.

The second poster design competition achieved its original aim of producing an excellent poster design, and the series of events ended in overall success, including the highly popular exhibition displaying prize-winning works. However, Mitsukoshi stopped soliciting designs from the public thereafter, with its design department’s Sugiura Hisui given the task of creating posters. This move was partly because Hibi Osuke, the company’s senior executive director who had concocted the idea of a poster design competition, practically retired in July 1913 for health reasons. Another plausible explanation is that Nihon Seihan, a printing company based in Osaka, held a similar advertisement design competition in the same year using Mitsukoshi’s application guidelines, though with reduced prize money. Since some of the prize winners had also ranked high in Mitsukoshi’s two competitions, the new contest is thought to have prompted Mitsukoshi, which prided itself on pursuing innovative advertising activities, to make an “honorable retreat.”

Nevertheless, Mitsukoshi’s two poster design competitions remain as noteworthy events in Japan’s advertisement and design histories. The undertakings also had a far-reaching influence in various fields over the following years and set the direc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dvertisement posters in Japan.

はじめに

本稿は三越呉服店（以下、三越）が1913年に催した、「第2回広告画図案懸賞募集」の意味や役割について検証し、併せて上位当選作とその作者が、その後どのような経緯をたどったかについて、考察することを目的としている。

三越が自店の使用するポスター用原画を得るために、当時としては高額な1等賞金1000円を懸けて作品を公募したことについては、日本の広告史やポスター史においては、必ず言及されるべき出来事として認識されている。

例えば、日本の広告史研究において底本となっている、1951年に株式会社日本電報通信社によって編集発行された『広告五十年史』の中では、「四十四年には広告画懸賞募集を行い、応募三百一点の中一等（賞金一千円）橋口五葉 二等（同二百円）山田秋畝 三等（同一百円）三間印刷所図案部 四等（同五十円）岡吉枝 五等（同廿五円）村山耕花、内野杏城、岡島建男、塩崎逸陵、林緑水、徳永柳洲が入選、橋口五葉作品を三間印刷所で印刷、春期大売出し用ポスターとして配布し好評であった。菊判全紙三十五度刷（原画は橋口五葉作、株式会社三越所蔵⁽¹⁾）」と記され、1等当選作となった橋口五葉の《此美人》【図1】については、カラーで作品が紹介されている。

また、戦前から戦後にかけて、グラフィックデザイナーとして第一線で活躍する傍ら、斯界の史的
研究においても功績を残した山名文夫は、1967年に東京アートディレクターズクラブが編集した『日本の広告美術：明治・大正・昭和1 ポスター』に寄稿した「概説：日本の広告美術」の中で、「近代ポスターの発端ともいえるものは、やはり明治44年に三井呉服店が三越呉服店となってから、記念のために懸賞募集したポスターがそれであったといえよう。そしてまたこれが、最初のポスターの公募であったかも知れない。非常なセンセーションを起こしたと見えて、当時として301点という